

《中国近代史》第十章第四节

作者：张海鹏 发布时间：2004-6-22 12:40:52

第四节 国共合作形成 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俄国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也推动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阀之间矛盾日渐加深。在北方，以吴佩孚为代表的新兴的直系军阀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在南方，桂系军阀陆荣廷与滇系军阀唐继尧之间的联合破裂。随着唐又转向孙中山，孙中山再度燃起了重兴护法军的愿望。1920年6月3日，孙中山与唐继尧等联名发表反桂宣言，并很快劝说正在福建漳州地区的粤军陈炯明夺回广东。眼见各方反桂形势高涨，一心希望返回广东的粤军将领陈炯明自然也积极响应。8月12日，粤军在福建漳州誓师，开始分三路回粤讨伐桂系军阀。仅两月时间，陈炯明就在广东各界的支援下占领了广州。讨桂战争大获全胜。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等人从上海到达广州，次日即重组军政府，重新开始倡言护法，但孙中山很清楚，“现在大势，护法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他主张建立正式政府，用武力打倒北方军阀，统一中国。因此，他回到广州后，日夜操劳，一心准备建立新政府。

1921年4月7日，经过数月筹备，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4日，军政府撤销，孙中山次日正式就任非常大总统，宣告组成正式政府，并呼吁各国政府承认广州新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之政府。

广州政府成立后，先是征讨了广西桂系残余势力，统一了两广，接着孙中山便在广西桂林设立了北伐大本营，积极筹划乘胜出师，开始讨伐北洋军阀。但是，作为粤军将领的陈炯明并无北伐之心。为有助于劝说粤军帮助北伐，孙中山不得不把大本营牵至广东韶关。但就在孙中山开始北伐，并占领了江西赣州和吉安，直逼南昌之际，陈炯明突然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停止北伐，组织军队反击陈炯明，但因孤立无援，最终只得于8月9日离开广州，重回上海。痛定思痛，孙中山深切地感到他必须要学习苏俄。在从广州返回上海的船上，他就对随行人员表示：“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

孙中山一向对俄国革命抱以同情。在此之前，他曾同波波诺夫、马林等多位来自俄国的代表进行过谈话，也正是从他们那里得知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胜利原因的说明。因此，一到上海，他就开始积极同俄国代表进行联络。在同马林等人反复交谈之后，孙中山同苏俄全权代表越飞通过通信交换了相互的看法。在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即《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联俄的态度。孙中山从此明确告诫党内同志：“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在联俄的同时，孙中山也开始实行容共政策。孙中山回到上海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已经确定了联合国民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马林在与孙中山的交谈中，也特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的强烈愿望。对此，孙中山表示赞赏。同时，考虑到共产党新近成立，人数较少，孙中山很难接受两党联合的合作办法，马林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受到孙中山的欢迎。1922年8月，李大钊就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明确表示：“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自此之后，大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他们中不少人担任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职务。陈独秀等人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李大钊被指定负责国民党在北京方面的工作。在马林的劝说下，孙中山同意借鉴苏俄共产党的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为此他特别邀请了共产党人参加研究国民党的改组计划。当然，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由于陈炯明被打败，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政府，一直拖到苏联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后才全面展开。

早在与越飞的通信和会谈中，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要求苏俄在人力上和物力上援助国民党的要求。1923年春天，苏联政府也向孙中山明确表示了提供援助的态度。鲍罗廷及其随后来到大广州的大批军事顾问，就是苏联政府根据孙中山的要求派到中国来帮助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

鲍罗廷等人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鲍罗廷曾长期在欧美从事革命活动，斗争经验丰富。因此，他刚到广州，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孙中山公开讲：我们要革命成功，就要学俄国的方法来组织与训练，因为要学俄国的方法，所以我请鲍罗廷来做我党的训练员。“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经过鲍罗廷的推动，1923年10月25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改组特别会议。孙当场宣布仿照苏联共产党的办法，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国民党人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和共产党人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以国民党人汪精卫、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以及共产党人李大钊为候补委员，并以该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同时，他又正式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请他起草国民党的党章。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孙中山主持了第一次会议。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和酝酿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1月25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不仅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次大会，而且也是明白昭示国共两党正式合作的一次盛会。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数尚不足500人，但与会的正式代表中，共产党员的人数已达到25人之多，约占全体代表人数的11%。不仅“一大”宣言、国民党党纲、党章均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和研讨，而且大会上孙中山亲自提名李大钊为主席团五委员之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毛泽东等还分别为中国国民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最后选举正式的与候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42人，其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沈定一、于方舟10人为共产党员，已接近全体委员人数的四分之一。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分设执行部，指挥监督各地党务之进行。会议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改为海外）、军事八个部和秘书处。其中组织部部长为谭平山，宣传部部长为戴季陶，工人部部长为廖仲恺，农民部部长为林祖涵，青年部部长为邹鲁，妇女部部长为曾醒，军事部部长为许崇智，各部部长下设秘书，一半均为共产党人。国民党改组工作对共产党人作用之重视，可见一斑。

国民党“一大”的顺利进行，显示孙中山“以俄为师”所进行的改组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政纲，都较此前国民党人的主张更加趋向革命化。宣言和政纲进一步阐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二求国内各民族之平等，“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当以孙中山主张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为原则，实行普遍选举制，必使一般平民共享权利，即必使“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则坚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主张，强调凡规模过大，或具有独占性质之企业，当由国家管理之，必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同时必须提高劳动者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宣言明确强调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待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

不难看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正在向着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方向迈进，它不仅预示着一个新的国民党正在诞生，而且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下一节](#) [上一节](#) [返回目录](#)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您是第位访客